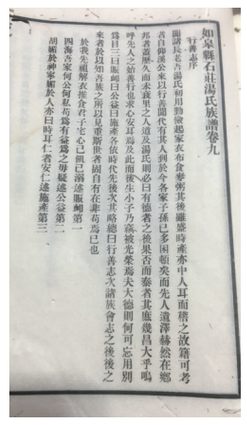
编辑:施亚泽 美编:刘玉容 校对:曹云 组版:翟晓东

左:汤氏老宅二进大门。中:《汤氏族谱》书影。右:老宅的几处传统装饰。



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九

行善志序

养生福地汤氏老宅

□彭魏

汤氏老宅坐东朝西一进商铺,今已不见。二进即二门堂五间,三进为敞厅五间。二进为六架梁,檐高3.2米,脊高5.5米,总面积约115平方米。三进为七架梁,檐高、脊高与二进相近,总面积约180平方米。二进门前有一对长方体白色石雕门墩,刻有麒麟、梅花鹿、老树、梅花等图案,寓意着主人富裕长寿。门上嵌入长方形砖雕,左右对称的卍字形雕刻缀于顶边,中间为同盆连枝花草清供美图。此门背面顶部雕有蝙蝠连理枝图案。两厅内各有木柱,落地处为软磉、青石磉,中柱为驼梁童柱,屋顶为黑砖,梁上有简洁的木雕。两进之间,还有一座天井(庭院),即过道。过道两边厢房,尚有一间留存。其建筑风格,或多或少反映了汤氏老宅为明代建筑。

石庄有一条古街,古街边有一处老宅——汤庚故居,俗称汤氏老宅。

石庄汤氏,颇有历史。翻阅《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六·仰溪公传》可知,石庄汤氏始祖汤魁,字仰溪,生于浙江武义名门。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侵犯浙省,汤魁北上,卜居石庄竹岭。他好施舍,以长厚闻名乡里。

在始祖汤魁影响下,乐善好施成为石庄汤家家风。《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九·行善志》记载,汤氏勤俭起家,即便家族兴盛一时,也只是中产家庭(此应为谦语)。尽管如此,汤家代代有人热心公益,救济灾民。汤世杰出资铺就北街石道;乾隆四十四年,汤锡重建坍塌的北王庄石桥;嘉庆二十五年,汤茂椿捐钱六千四百,汤应中、汤廷璜各捐钱二千四百,汤洵直、汤洵彦(汤庚父亲)各捐三千二百,汤百骏、汤德全各捐六千四百,修建石庄同善堂水龙;道光七年,汤珍等族人又出资修建石庄凤鸣桥;同治十一年,竹岭文社于石庄东街关帝庙文昌宫内兴办学校,汤炳晖、汤增鑅各捐钱一万、一万两千。

确凿捐款数据的记载,无不说明汤氏一族富甲石庄。富裕的汤家南三房族人,还于明末修筑了这座汤氏老宅。

此居主人汤庚,字芷衡,别字笙白,善诗工医,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于民国元年(1912)。他幼承家学,可惜15岁才立志举子业,25岁过县试。38岁时,晚清名臣、进士黄体芳(1832—1899)主考史论,汤庚成绩名列前茅。次年,他补增广生,两年后再补廪膳生。日后,他被县知事聘为董保甲,服务乡梓约十年。晚年,他还领导竹岭文社多载。(见《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六·清宪先生传》)。

对于石庄汤家人来说,这座汤氏老宅可谓养生福地。汤庚的祖父为汤东易,是一位雅士。《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七·克宽》记述,汤克宽字东易,国学生,屡试南北闱未中,善琴,生于乾隆十二年,卒于嘉庆十七年。《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六·东易公、宏度公兄弟传》又记,张太孺人问其志向,汤东易答曰:“儿冀博一第,慰先人九泉。苟得消闲琴书,终吾天年足矣,富贵不敢望云。”他不是信口说来,而是心中希冀。传记又记,汤东易日坐斗室,研读经史,足不出户。

汤卿云是汤庚的父亲。《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七·洵彦》记述,汤洵彦,字卿云,生于嘉庆九年,卒于同治九年。

《如皋县石庄汤氏族谱·卷六·卿云公传》记述他的养老生涯:每当午睡初足,茶一瓯,香一炷,散步家园,随意读古书数篇,亦或抚花竹,亲鱼鸟,欣然终日。竟不知老之将至。

引言尤短,意味深长,再现汤氏老宅的美妙:有花竹,有鱼鸟,主人读书闻香,怡然自得之状,跃然传中。

汤庚秉承家传,亦好饮茶。他于古宅中,清夜独坐;于茶香中,闭目冥思。他还打趣地作有《闲居偶赋》:“一庭花竹,无客亦评茶,有钱便食肉。往来谈笑适心怀,行住坐卧无拘束。”诗人的悠闲神态、老人的清闲心态,都在这所老宅中得以恣意舒张。

近日,作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汤氏老宅正在被进一步修缮。待到里外修理完毕、重新开放,想必会引来热爱文史、盼望长寿的各地游客。

张謇:治水先行者

□张圣嗣

在著名水利专家宋希尚的眼里,张謇是一位伟大的治水先行者。张謇实业救国的同时,进行着长江、黄河、淮河、大运河等的治理,规划疏浚,开挖了几十条河道,建造了一批码头、水坝、桥闸,办起了中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学府——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引进了西方水利技术与专家,设立了治水机构,募集了治水经费……他是清末民初唯一一个在几十年里始终关注、琢磨、实际支持并常常身体力行地治理水患的实业家。

仅举南通之例: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以后,长江深泓北移,江水冲击通州江岸,东起姚港、西至天生港的10多公里江岸发生大面积坍塌。为了阻止水患、保卫家园,张謇出私资3000余元,请上海浚浦局派员来通勘测水势、绘制地形图、编写说明书。《南通保坍报告书》中记载:“查天生港、姚港之间有暗潮之冲刷。宣统二年(1910年)七八月间,潮水泛滥,沿江35公里连破30多圩,4000余户受灾,2万余人流离失所。遭损后九月,修补了几座桥梁、公路,开浚了几条河道。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成立南通保坍会,公推张謇为会长,当年保坍会以工代赈,雇工修筑天生港至姚港之间江堤6000米,底宽20米,面宽6米。”

1912年3月,南通保坍会重新成立,仍推荐张謇任会长,设堤工事务所,负责筑楗保坍工程,绘制了“一面阻止水流之冲击力,一面为自身之基础不为水流冲击所动摇”的保护物,即大小水榭图,使用筑木建法来阻止坍岸。正在施工过程中,特莱克不幸在南通病故。后来张謇聘请了宋希尚负责工务。宋希尚来南通时,在天生港的两楗已经完成,位于芦泾港的第三楗正在建设。到张謇去世前, 保坍会在南通沿江共筑楗18座,楗与楗之间相应的岸墙工程约18 里,使沿江岸线逐渐趋于稳定, 成效明显。

在南通江边小洋港闸施工时,张謇正在建设靠近长江的五山地区,需要确保该地区的棉花试验场、苗圃、园林、名胜古迹等既不被洪水淹没,又能进行正常排灌,因此,在该地区临江的小洋港建设了一座能蓄水御潮的水闸。九门大闸落成的庆典上,张謇作了致辞。在致辞中,着重对水利专家宋希尚的事迹表示赞许。九门大闸的拦潮墙上,镌刻着张謇手书的“遥望港闸”。

1926年8月,已有寒热的张謇清晨亲往江边视察工程,回寓后病情转重,连日高烧不退,不幸离世。

宋希尚在《河上人语》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一,以南通小邑,竟与长江水力相搏斗,唯张公之力谁能办到? 二,以一县地方水利问题,竟能请到世界水利专家数十名之多,躬临踏勘,几成国际上研讨专题,全国未见其二。三,以一县之力,维护长江袭击, 中央与省均袖手旁观,为世界各国罕见。四,因张公领导,地方协助征收亩捐,自卫自助,此所以南通为地方自治之楷模,难能可贵。五,在经费支出困难中,此项筑楗保坍,竟能保卫二三十里天天坍陷之江岸, 为保坍工程放一异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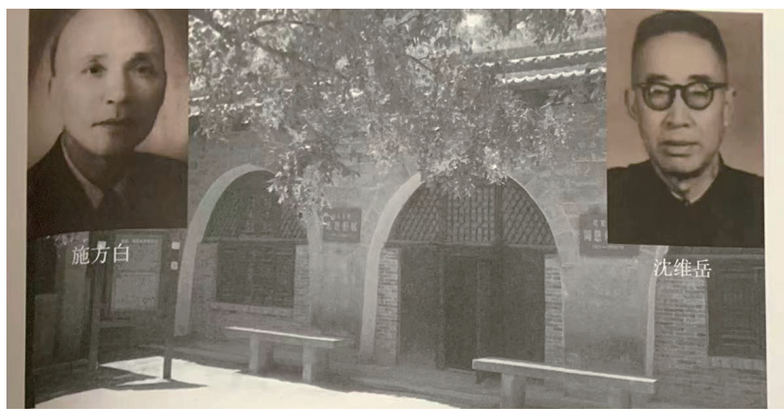
烽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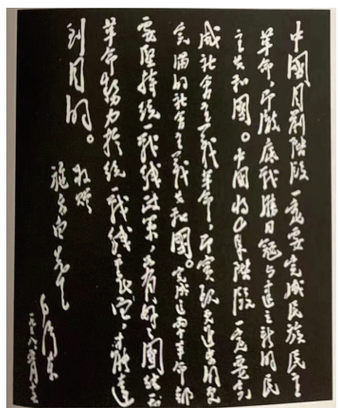
沈维岳的传奇人生

□沈卫民

在南通地区,从黄埔军校毕业并参加北伐战争的人很少;到革命圣地延安,三次见到毛主席,并聆听其指出革命方向的人更少。从信仰三民主义到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参与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沈维岳就是有这样传奇经历的人。

下图左起:沈维岳与施方白1938年在延安与毛主席见面的窑洞;毛主席的题词,全文是:“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毛主席所赠照片。





投身黄埔军校参加北伐

沈维岳1899年出生于江苏启东北新乡,早年在崇明师范读了一年书,因贫困辍学回乡,当了小学教员。中华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土沦丧,他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投笔从戎。1925年,经同乡季方先生的介绍,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北伐战争开始后,因前线需要,五期学员提前和四期一起毕业,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所以他们也称四期生),从广东经福建打到浙江、上海。他先后任政治宣传员、十七路军连政治指导员、十四路军营政治指导员等职。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沈维岳因有反蒋、同情共产党的言论,遭软禁审查,差点被杀。他逃出上海,几经周折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叛变革命,搞“宁汉合流”,镇压屠杀共产党人,无奈他只好辗转回到家乡启东,不久担任县公安队队长,后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而被革职。

1930年春,沈维岳到上海,和季方参加了邓演达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和黄埔革命同学会。邓演达是国民党元老,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国民党和黄埔同学中有很高威望。他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独裁。1931年8月15日因叛徒出卖,国民党反动当局在上海逮捕了正在开会的邓演达及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十多人,沈维岳也一同被捕入狱,被押到南京,关在陆军监狱。3个月后,邓演达遇害,沈维岳和其他战友后被宋庆龄营救出狱。

沈维岳经周士第(也是第三党成员)介绍,到19路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随19路军到福建,19路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反蒋,又遭镇压失败。沈维岳被迫返回上海,重新参加第三党的地下反蒋活动。

到延安参观,毛主席解疑指路

西安事变后那段时间,沈维岳在武汉任田家镇要塞区参谋主任。1938年春,沈维岳和启东同乡、第三党中央委员施方白先生决定,到延安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是怎样抗日的。

施方白也是启东北新乡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算辛亥老人,是民国后启东的第二任县长,北伐时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他熟识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们去找董必武和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协助去延安。

几经辗转,他们在4月30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是“五一”,延安在开庆祝会,毛主席作报告,他俩作为客人被安排在前排。毛主席讲的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5月3日上午8点,毛主席接见了施方白和沈维岳。他们先后提了九个问题,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前途的大题目。毛主席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分析明快精辟,使人信服。他又向二人指出,要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道路。

他们第三次和毛主席见面时,施方白拿出一张宣纸,请求毛主席题词。主席欣然答应,第二天派人把题词送到招待所。

在延安参观十多天后,沈维岳决心回家乡组织队伍,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参与开辟南通地区抗日根据地

延安归来,沈维岳在上海几经波折,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华东武装抗日委员会”,年底经武抗派遣到启海地区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当时启海地区一片混乱,各种旗号的武装多如牛毛,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是司令。沈维岳找了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启东县县长周儒谦。周是开明人士,他安排沈维岳担任县政府常备总队副总队长(周兼总队长)。有了合法身份,又有他的声望和人脉关系,很快收编了不少零散的游击队,有了几百号人,上海武抗派了杨进同志来担任总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经杨进和武抗领导高原介绍,沈维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了党的领导,队伍扩充更快了,但这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队的眼红,他们经常搞摩擦,想要吞并这支队伍。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中共江北特委负责人洪泽同志来了,动员沈维岳把队伍拉走,参加抗战支队。于是沈维岳带了400多人和枪支离开启东,到南通加入梁灵光的抗战支队二总队。梁灵光同志是总队长、沈维岳任副总队长,抗战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正式武装。

1940年夏天,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东进。抗战支队第二总队迎接主力东进,部分人员先后参加了郭村战斗、黄桥决战和掘港保卫战,队伍也上升为主力部队。1941年新四军成立苏中四分区,季方任司令员,沈维岳任参谋长。1941年8月,苏中行政公署派沈维岳回启东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东南行署副主任,于是他又回老家和战友们一起坚持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直到抗战胜利。

1942年1月4日,时任启东县县长的沈维岳和海门中心县委书记陈国权、启东县委民运部长石坚等人,到启东二厂镇布置召开群众大会的事宜,中午被北新镇的伪军胡鹏部队包围,敌众我寡,他们几个决定分头突围。后陈国权等三人不幸被枪杀牺牲;沈维岳因是本地人,经老百姓掩护突围出去,又一次虎口脱险。

解放战争时期,沈维岳先后任苏中九分区军政干校副校长、山东渤海公学教导主任、三野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团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维岳先后在南京、上海工作,历任南京公安局五处处长、上海市劳动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文管会秘书主任等职。1962年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调回南通,曾担任中共南通市统战部副部长、南通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89年因病逝世,享年91岁。

江海回声

□陈建吾

陈国藩同志,原名陈志承,生于1908年2月,原南通县双楼乡人。1924年前后考入原通州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接触到革命组织“晨光社”的成员,是当时有机会读到《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等秘密刊物的少数人之一。

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陈国藩积极投身革命洪流。1925年他与刘瑞龙等同学来到南通县西部的平潮、刘桥和白蒲等地,从事反帝反封建宣传,号召当地民众与地主斗争。

1926年他们又来到南通县东南部的小海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在小海,他们积极组织农会,公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减租减息和荒年免租保田,为贫苦农民争取利益。

其间,陈国藩与袁锡龄、刘瑞龙等同学以及南通中学的顾民元(刘瑞龙表弟)等,在恽代英及其弟恽子强的帮助下,筹办成立了南通革命青年社。

1927年9月,刘瑞龙、袁锡龄和陈国藩等同学光荣入党,同时,通州师范党支部和团支部也宣告成立,刘瑞龙首任党支部书记,袁锡龄首任团支部书记。

南通革命青年社主要活动地点位于通城长桥以南旧称“南门”的一带,其中一个重要落脚点为一户熊姓人家,而熊家有个女儿,正是陈国藩的未婚女友。后来她得知了陈国藩牺牲的消息,终身未嫁。

陈国藩、刘瑞龙、顾民元等一众革命骨干,在青年社的基础上,又将革命活动扩大到唐闸棉纺厂一带。他们利用周末、寒暑假和课余时间,举办工人夜校、帮助组织工会、指导开展工人运动,积极为工人争取加薪并谋求各种福利。后因受到厂方阻挠,夜校被迫转移到城西白龙庙小学继续开展教学与革命活动。

陈国藩既是夜校的重要组织者,也是主要教员。同志们积极利用夜校形式,总结工运经验,分析革命形势,宣传先进思想,散发红色传单,教唱进步歌曲。

1928年6月,南通县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形势变得错综复杂。为应对白色恐怖,陈国藩与刘瑞龙两位同志常躲藏在乡下,就住在我家里。每当这时,我太公就安排刘同志与二儿子陈国彬合睡一床,小儿子陈国藩则睡临时搭起的简易床铺。

我太公名叫陈汝春,陈国彬是我祖父,陈国藩是叔祖父。陈汝春和陈国彬父子为私塾蒙师,且均具进步倾向。而我家开设私塾蒙馆,家境宽裕,在当地也有些影响力;人来人往,又便于掩人耳目。在乡下躲难期间,陈、刘二同志并未全然赋闲,而是积极为当地养牛户奔走斡旋,并指导大家进行抗捐抗税斗争,从而成功为他们免除了牛捐。

南通县委机关遭严重破坏后,江苏省委指派陈国藩担任南通县代理县委书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但因叛徒出卖,陈国藩被捕入狱,后经通州师范全力营救,加上一熊姓警官挺身担保而获释。

出狱后,陈国藩转身前往上海寻找组织(因形势需要,当时江苏省委暂时设在上海),被临时安排在上海浦江中学读书,并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与刘瑞龙等同志秘密筹建武装力量,策划购买枪支弹药,从上海十六铺运往南通青龙港,再转运至南通东部的东社等地。

随后,陈国藩也被指派到南通通东地区开展工作。在东社、余西一带,他根据上级指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开展农民运动上来,在农村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武装革命,又参与组建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其间,陈国藩担任南通县县委委员、红十四军二师二大队政治指导员。他与通东地区特委委员、红军游击队队长陈宗恒并肩作战,在物质条件艰苦的通东地区坚持开展农村武装斗争,被红十四军的同志们亲切称为“二陈”。

1930年10月17日,陈国藩领导的通东地区武装政权相关人员在东社跑灶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因事前走漏了风声,与会同志遭敌人伏击。在突围中,陈国藩腰部中弹倒地,战友发现后,立即将他背起撤退,但终因失血过多,加上凫水渡河,伤口感染,壮烈牺牲。